

脱口秀女王奥普拉:我坚信(1)

◆ 奥普拉

弥合过往的创伤

不论我们是谁,从何处来,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程。我的人生始于1953年4月的一个下午,在密西西比农村。在那里,弗农·温弗瑞和维尔妮塔·李婚后孕育了我,他们那天毫不浪漫的一夜情缘造成了一场意外的怀孕。我母亲隐瞒了她的状况,直到我出生的那一天,所以没人准备好迎接我的到来。没有迎接婴儿的聚会,没有那些翘首盼望未出生孩子的朋友们揉着隆起的肚子的敬畏、脸上那种期待或快乐。我的出生被打上懊悔、隐瞒和耻辱的标记。

当第一个提出“内心童真”的作家、心理咨询师约翰·布拉德肖在1991年做客《奥普拉脱口秀》时,他让我和观众们进行了一场复杂的练习。他叫我们闭上双眼,回到我们长大的那个家,在脑子里勾勒出那栋房子。“走近点。”他说,“透过窗子往里看,你发现了自己在里面。你看到了什么?更重要的是,你感受到了什么?”对我而言,那是一个极其让人悲伤却又给人力量的练习。我在自己成长的每一个阶段能感受到的几乎都是孤独。不是独自一人——因为我周围总有人,但我知道我灵魂的存活完全依赖于我自己,我必须保护自己。

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,我曾很期盼教堂礼拜后有客人来我外祖母家。他们离开后,我便会很害怕与外祖母独处。我的外祖父已经老态龙钟,而外祖母时常精疲力竭又毫无耐心。我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孩子,所以必须得学会自己待着。我发明了各种新方式来与自己独处。我有书、有家里缝的洋娃娃、

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,拥有超过 10 亿美元个人财富,被誉为“脱口秀女王”。这个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黑人女孩,是凭借怎样的个人信念创造出今日辉煌的? 黑天鹅图书5月引进奥普拉首部著述《我坚信》,让读者有机会走进奥普拉坚韧的内心世界。



■ 《我坚信》封面

有家务活,我还会常常给农场里的动物起名字,跟它们说话。我坚信,所有那些独处的时光对决定我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极为关键。

透过约翰·布拉德肖的窗子回望人生,我很悲伤地发现,跟我最亲近的人都没意识到,我那时是个多么甜美的小姑娘。但这也让我力量陡增,因为我凭自己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。

就像我一样,你也许也经历过一些事,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我坚信,弥合过往的创伤是人生最艰巨也是最值得的挑战。知道你是何时及怎样被塑造成现在的你,然后你才能改变那些影响。这么做是你自己的职责所在,不关他人的事。一条无可争议的宇宙法则是: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

最艰苦的挣扎

多年来,我一直有个几乎无人知道的秘密,甚至包括好朋友盖尔。虽然她知道我的一切,但也是直到我们俩成为朋友多年之后才知道这

个秘密的。斯泰德曼也一样。我隐瞒了这件事,直到我觉得足够安全可以把它告诉别人——从10岁到14岁,我被人性侵犯了,由此导致了我的滥交,最终在14岁那年怀孕。我羞愧极了,隐瞒了怀孕的事实,直到我的医生注意到我肿胀的脚踝和隆起的腹部。1968年,我生下了孩子,他几周后就在医院夭折了。

我回到学校,谁也没告诉。我害怕的是只要有人发现,他们就会把我开除,所以我把这个秘密一直埋在了心底。我总是担心有人发现当时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,他们就会将我 from 他们的生命中“开除”。甚至直到我鼓起勇气公开了被性侵的事时,我仍背负着耻辱,所以对怀孕一事闭口不言。

当一个家庭成员把这件事爆给八卦小报后,一切都改变了。那个家庭成员现在已经死了。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,深受重创,被人背叛。这个人怎么能如此对我?我哭啊、哭啊。还记得斯泰德曼在那个周日的下午走进卧室,卧室的窗帘紧闭。他

站在我面前,看起来好像也刚刚流过泪,说:“我真是太抱歉了,你完全不该遭受这种事。”

新闻爆出来的那个周一,我强打精神从床上爬起来去上班。我觉得既溃败又害怕,想象着街上的每个人都会伸出手指着我尖叫:“14岁就怀孕,你这邪恶的姑娘……开除你!”但是,没人这么说——陌生人没有,我认识的人也没有。我震惊极了。大家对我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。几十年来,我一直害怕着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结果。

从那以后,我也被其他人背叛过,虽然对我是当头痛击,却再也没有让我哭泣不已或蜷在床上。每一个艰难时刻都有一线光明,不久我就意识到这秘密公之于众后我就被解放了。直到那时,我才能开始修补在年轻时所受的重创。我意识到,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在责备自己。而我从中学到的就是,背负耻辱是最大的重担。当你没什么可羞耻的,当你知道自己是谁,你就会坚持做自己,你就能站在智慧之光下。

无论何时,当我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时,我会问自己:“如果不是害怕犯错、被拒绝、显得蠢极了,或害怕孤单的话,你会怎么做?”我坚信的是,当你克服这种害怕,你要寻找的那个答案就会随之显现。当你直面自己害怕的东西时,你应该坚信,只要你愿意并敞开心扉,从最艰苦的挣扎中就能生出你最强大的力量。

成功与被困的差距

我一直都很自豪于我的独立、正直和我对他人的支持。但自豪与自傲之间只有一线之差。我学会了,有时你得从自傲中走出来,才能认

清事实。所以,当生活变得艰难时,我发现,最好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:这一刻到底想要教会我什么?

我还记得1988年我第一次成为《奥普拉脱口秀》的所有人,我得买下一个工作室,聘请所有的制片人。我对很多事情都一窍不通,在最开始的几年里,我犯了无数的错。幸运的是,那时我还没那么出名。我能学到教训,然后私下里从中得到成长。

今天,成功的代价之一就是我的教训都是公开的。如果我绊了一跤,公众都会知道,有时候这种现实的压力逼得我想要尖叫。但我坚信一点:我可不是只会尖叫的人。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——四次——我这一生中对别人提高嗓门的次数。

所以当我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时,我总是会去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厕所的隔间就特别管用。我闭上双眼,视线转向自己的内心,深呼吸,直到我能感觉到心中那个宁静的小空间。它跟你心中的宁静,与树林中的宁静,与世间万物的宁静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深呼吸着,直到我能感觉到这个空间扩张开来充盈着我。最终,我总会做跟尖叫截然相反的事:我会为所有这神奇的一切而微笑。

不论你在人生旅程中身处何处,我希望,你也一样能不断碰到各种挑战。如果能够在挑战下幸存,那就实在是种福气了,能够不断地一步一步前行——身处于能爬上人生之顶的地方,知道巅峰仍然还在前面。你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无比的。

我们都曾经历过被击溃的时刻,这些时刻令我们必须得站起来。我坚信,所有障碍都有意义,能否敞开心扉从这些挑战中学习,就是成功和被困之间的差距。

传奇大将陈赓

尹家民



14.灵机一动

1925年2月,东征开始了。3000多名黄埔军和9万陈炯明的部队拼杀起来。黄埔学生初出茅庐,却英勇无比,很快打到棉湖。

一天,蒋介石查获了滇桂军与林虎勾结的电报,隐约意识到广州方面不稳。蒋介石会同苏联顾问、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商量,决定派人化装返回广州探听虚实。派谁去当侦察员呢?周恩来首先想到了陈赓。

“你马上过江,把广州的情况调查清楚。他们很可能要搞武装叛乱哩,要拯救广州!”周恩来说。“我一定完成任务。”陈赓很有把握地回答,“给我一身西服,我化化装。”

走出指挥部时,陈赓已经是学生装扮。在江边,他找到摆渡的船家。船至江心,两岸的军队突然隔江对射起来,枪声震耳,划船的姑娘吓得躲进船舱。船在江心漂泊,陈赓自己划了几下桨,不得要领,对姑娘说:“你别怕,不是朝我们开枪!”“先生,我不要你的钱,你坐别人的船走吧。”“小姑娘,子弹还远着呢。不信,我站着,你坐着划!子弹打胆儿小的!”“真的么?”姑娘疑惑地摸到船桨,“朝哪儿划呀?”“向北,继续向北!”

陈赓混进了广州城,此时,广州已完全处于叛乱的滇军控制之中。陈赓在街上走着,警惕地望着路两边。受伤的商人匆匆忙忙把自己货物运到外国租界和香港。敌人沿街散发反共反苏传单,彩色纸片在空中飞舞。陈赓灵机一动:这不是送来的通行证嘛!他装作系鞋带,蹲在一捆传单旁,拎起来就走。他假装散发传单的人,碰到戴红帽子的滇军搜查,就塞过去几张。3天里,竟然畅行无阻。他调查清楚了:留在城里的桂军总共只有守卫刘震寰司令部的近1000名士兵,其主力部署在北面铁路沿线靠近广州的各车站上。滇军在河南岛对岸的广州河岸上开始用沙袋堆成街垒和鹿寨……

他把侦察到的敌情绘在传单背面,准确地标明敌人部队位置和火力点,准备第二天返回指挥部,却出事了。当他经过惠爱中路

时,路上涌来了滇军军官学校的队伍,“拿获共产党就地正法”的牌子在半空中摇晃,喊叫声、喝令声响成一片。人们穿过树木成行的街道四散跑开,只剩陈赓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中间。跑,无疑会暴露身份。于是他决心迎着他们走去。几个滇军喊他站住。陈赓停下来,目光直视他们。他还想冒充散传单的,可惜传单都撒光了。其中有个长着一双冷眼的棕眼珠的人上下打量起陈赓:“黄埔军校的吧?跟我们走吧!”

“我是高师的!”陈赓十分坦然,指指胸前早已别上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徽章,一口咬定,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棕眼珠直视着陈赓的脸:“高师的?你敢去对证?”“对证就对证,走!”陈赓知道,此刻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,闯过一关是一关。两个滇军押着他来到高师门口。黑洞洞的枪口抵着他的腰,逃跑是不可能的。他想前去向门房打声招呼,被滇军的枪杆拦住了。陈赓并不畏惧。站着沉默不语,那是一种异常冷静的沉默。他心里暗想:“你们征服不了我,休想征服!”门房走过来,谨慎地迈着步子。当时杨、刘叛军在广州勒索筹款,贩烟开赌,无恶不作,人们对他们十分厌恶,都希望革命军早点胜利。所以门房一见陈赓英气勃勃,断定他是个“革命军”,嘴里连声说道:“是,是我校的……”陈赓就此脱险归来。

6月12日,东征军发动进攻。陈赓率领部队,迅速渡过珠江,一口气打到了北校场,杀得敌人溃不成军。杨希闵被打败了,他收拾残部,准备沿广九铁路退回到石龙。陈赓怎么肯让敌人逃跑。他一方面向周恩来、蒋介石报告战情,让其火速调派队伍增援围歼;一方面亲自带领自己的连队,到火车站侦察敌情。陈赓到火车站后,发现火车站的工人是同情革命军的,于是,他深入虎穴,乔装打扮与火车站的工人工会接上了头,指挥他们在最恰当的时机发动罢工。

逃命要紧,杨希闵的部队慌慌张张钻进了火车车厢。当陈赓得知援军已经到达后,马上与工人工会领导分头告诉各火车的司机和铁路工人,大家同时行动,顷刻间便四散逃跑一空,留下一车车的溃军目瞪口呆。等我军攻来时,敌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防御,有的车厢数百号敌人连车都来不及下就成了俘虏。

9.话题不是研究出来的

回想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,我还是个大學生,真的是好彷徨啊!彷徨,旧的被打破了,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,那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转变过程。我对詹国枢谈的内容很有共鸣,眼前的转换带来的彷徨,是积极情绪的准备,比麻木状态要好得多。彷徨是刚醒过来的感觉,彷徨太久是要误事的。接下来得尽快进入寻找、创造状态。

有一些人率先走出彷徨,他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,是邓小平南巡后下海的儒商。我在《一丹话题》里,向儒商提问:从儒到商有没有转变的痛苦?知识分子下海,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?知识分子办公司往往伴随着主张、理念、追求,怎么理解这种现象?有的儒商还存有最终回到书斋的念头,怎么理解?为什么清高的商会趋向世俗的商呢?儒商对公司文化形成有什么作用?知识分子走进商潮会带来什么色彩?儒商怎样看发明、技术和企业运作的关系?什么样的人更能看清儒商的意义?

可以说,与儒商的交流使得我认识了一种很有潜力很有后劲的力量。后来,他们这一批人被称为“九二派”,激流中沉沉浮浮,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跃的群体。在后来每年一度的亚布力论坛上,我看到他们依然释放着活力。20年后,有“九二派”中的儒商看到这些当年的问号。在他看来,有的问号已经用实践回答了,有的今天仍有价值。我想,有机会,再问冯仑潘石屹他们,看这些儒商如何回望一路风尘。

做记者的,都会对流行语反应敏感,不同的时代背景,有不同的流行语。《一丹话题》在谈到1993热词时,引用了这样一些说法:“每次商品价格一出台就伴随三个字:承受力。”“大白菜!年年强调大白菜,它成了某种象征。”“粮票成了文物了。”“北京有个说法:点替”,“东北有个说法:拼缝”。“下海,练摊儿,干第二职业。”“价格改革后,猪肉蔬菜放开,一会儿多一会儿少,把人弄得焦头烂额。记者用琼瑶笔法写道:月朦胧,鸟朦胧,菜朦胧,猪也朦胧。”

变化的时代,人活跃,新词多,生活变得生动了。我在节目里说,如果把新词编成词

典,留给后人看,那是非常有历程感的事。粮票、布票,眼见着在我们面前变成新闻里的热词,又变成历史。记得粮票即将取消时,不那么珍贵了,我们就用多余的粮票去和小贩换塑料的盆盆罐罐。布票废止以后,我很长时间都不大相信似的,见到花布就去抚摸,就想买,我是小时候被布票吓坏了,生怕以后又要布票。我当时买的各色花布攒了一包,直到现在

还宝贝一样珍藏着,快成“文物”了。媒体人,亲历这个阶段,记录这一现象,挺有意思,让后代知道紧缺经济下的票证是怎么回事,让后代理解粮票布票的终结意味着什么。这些话题,都有着—个共同的背景:转型期。在《一丹话题》开播之前半年,中国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,这是决定中国人未来的大事。转型期的特点逐渐显现:新旧碰撞,思想激荡,旧的平衡打破,新的秩序在建立中。

《一丹话题》最初的话题并不是研究出来的,而是感觉出来的。我和周围的人一样,也在碰撞中、激荡中、困惑中、失衡中,身边的变化使得我很自然地把目光聚焦在“人”上——转型期变化中的人。人的观念与思维、人的行为与选择、人的失衡与调整,都与大背景相关,成为社会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,也激发着我探究和表达的欲望。

面对纷纭的世界,《一丹话题》说什么?不说什么?我会情不自禁地关注一些现象,情不自禁地关注一群人,情不自禁地想和人讨论,情不自禁地想和观众交流。当我出现这样的状态时,遵从内心的感觉,走到话筒前,成为最自然的选择。“情不自禁”也许是主持人的一种值得珍视的好状态。不是为了完成工作量,不是应付命题作文,不是为了把每期8分钟的时间填满——就是强烈的表达欲望,不说憋得慌。

教育的话题,总是让我情不自禁。在《一丹话题》之前,我在《经济半小时》多次做教育主题的节目。以至于作家梁晓声说:“你有点教育情结了。”在经济频道、经济栏目,为什么没完没了谈教育呢?就是“情不自禁”。经济和教育怎么分得开呢?它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啊,可以互相促进也可以互相制约。

我遇到你

敬一丹

